

范源廉的职业教育实践及其现实启示

王哲文

摘要 范源廉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并以行政官员和教育家的双重身份影响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具体而言,范源廉秉持“教育救国”和“教育改造社会”的观念助推职业教育发展,他不仅以教育行政官员的身份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制度化建设,还在职业教育与社会需要相结合、调整职业学校结构、实际资助职业教育事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此为鉴,当今可以从落实职业教育地位和功能、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化建设和施行校企合作等方面,促进现代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范源廉;职业教育;民国教育;近代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27-0068-06

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史上,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或以教育家的身份活跃在职业教育界,或以商人的角色介入职业培训,更有身兼行政事务的官员投身职业教育事业。正是由于一批杰出的职教先驱的共同努力,才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的近现代转型。目前,学界对近代职业教育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张謇、黄炎培和蔡元培等近代职业教育主流人物上,试图通过对其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回顾总结,既还原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史的基本面貌,又能为当今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历史经验。事实上,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除了长期活跃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主流人物,还有许多教育家以不同的方式对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范源廉就是其中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范源廉(1876-1927),字静生,清末民初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教育家。民国初年(1912年),他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次长,此后又三度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以及担任各文化教育团

体董事与成员,对民初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教育家,学界明显对其挖掘有限。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范源廉本人“重行不重言”,留下的相关文献资料有限;二是民初政系党派之争纷杂,范源廉曾多次受命军阀政府管理教育,时人对其有所偏见。然而,有学者指出,范源廉一直秉承教育救国的坚定理念,与蔡元培等人实现了跨越党派的精诚合作^[1]。事实上,范源廉以教育行政者的身份,不仅在近代教育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成为中国由传统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型的决策者、实施者和推动者。就职业教育而言,范源廉也有着丰富的思想与实践,在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化过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教育救国:范源廉职业思想的动力来源

与同时代大部分先进教育家一样,范源廉是

作者简介

王哲文(1996-),男,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历史与文化(保定,071002)

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并躬行实践,投身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事业。同时,教育救国论的时代呼声及范源廉本人的实践也成为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动力来源。

(一)晚清教育救国的思想浸染

范源廉出生于清末,正值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众多仁人志士投身于救国图存的时代浪潮之中。在知识界,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其根本原因在于实用人才的匮乏,而实用人才的短缺又是由于教育的落后。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突破了中国传统“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思想观念,讲求实用技术及其科技人才的培养^[2]。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创办了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以培养实用和专门技术人才为目的的洋务学堂。洋务学堂不仅培养实用人才,还具有企业办学的职教特色。以此为契机,中国开启了职业教育的近代化历程,同时这也成为近代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肇始。虽然洋务运动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而宣告失败,但其为中国近代开辟的实业救国之路却一直影响着后人。

甲午海战后,维新人士开始崭露头角。范源廉出生于湖南湘阴县,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赴湘创建时务学堂,范源廉成为时务学堂学生,从此跟随梁启超求学受教,思想上深受维新人士,尤其是梁启超的影响。早在公车上书之时,梁启超就提出:“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3]。这也成为范源廉倡言教育救国和职业教育的重要发端。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前往日本,随后范源廉也往日本留学,修习师范科。范源廉在学习期间对日本教育强国之路有了深切体会,对教育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更加坚信了实业教育在培养人才、实现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归国后,正值清末新政改革之际,清政府设立学部作为全国最高教育领导机关,范源廉就任于学部,同时参与“新政”教育改革,践行其教育救国主张。

可以看出,生长并成熟于清末的范源廉,历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以及清末新政的近代时局变迁,在接受晚清教育救国思想的浸染后,投身教育革新运动当中,逐渐形成并丰富了自身的教育观念,其中就包括职业教育思想,对其日后付诸民初职业教育的实践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教育改造社会的躬行实践

辛亥革命胜利后,清帝逊位,民国肇建,国家面临建立共和体制、推进民主教育的艰巨任务。客观而论,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社会遗留问题依然严峻。对于教育而

言,教育结构的失衡、培养人才的呼声都促使民初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北京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在蔡元培力邀之下,范源廉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次长,两位声名素望的教育家都是教育救国论的忠实拥护者、职业教育的支持者。

北洋政府掌权后,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一职,范源廉随即接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上任后,范源廉指出:“教育为神圣之事业,乃国家生命之所存”^[4]。他力图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并最终达到改造和发展社会的目的,实现国家和民族自强的道路。当时,民国实业界和知识界也掀起了职业教育思潮。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先驱们为了解决人力短缺与平民生计潦倒的社会矛盾,主张把职业教育作为变革落后和贫瘠社会的驱动力,力图通过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实现建立文明发达社会的理想^[5]。民国初期,全国教育结构的失衡以及职业教育思潮的传播,始终与教育救国理念交织在一起。最终,在各方的推动和支持下,范源廉作为发起人之一,与黄炎培、蔡元培等人于1917年5月6日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身为教育和知识界领袖的范源廉,虽然更多是从整体上考量教育体系的建设,但在职业教育改造社会学说的推动下,也实际参与了民国职业教育的建设。总的来说,包括范源廉在内的近代职教先驱们,大多生长在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话语体系中,“教育救国”始终是他们倡言和践行职业教育的主旋律,伴随他们职教生涯的始终。对于范源廉而言,实业界与教育界掀起的职业教育思潮与其“教育救国”或“教育改造社会”的抱负大相契合,同时这股教育革新的决心也成为其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动力。

二、行政与实践:范源廉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

以教育救国、教育改造社会为指引,范源廉参与并推动着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由于范源廉数次出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又在各文化组织团体担任要职,其对民国职业教育的贡献既从教育体制上给予完善,也在实际中提供支持。

(一)继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实际颁行教育宗旨

民国初期,学界与政界一直保有密切联系,范源廉与蔡元培等知识分子不仅以学问立世,更在政界保有一定地位,成为民国初期教育政策的实际决策和制定者,制定颁行了民初以实利主义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宗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担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与陆费逵、蒋维乔等人筹谋符合民主共和的教育宗旨和方针。1912年2月,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军国

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的五育并举观,引起学界强烈反响。其中,实利主义教育不仅包括现代智育的内涵,还具有实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内容。陆费逵发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对蔡元培进行呼应,对实利主义包括获得生活的知识和技能,解决人民生计,提升国力,养成高尚人格都给予高度肯定,认为教育宗旨应以实利主义为教育方针的源泉^[6]。可见,民初蔡元培为民国教育谋划的宗旨就包括了职业教育的实际内容。然而,蔡元培当年7月即辞去教育总长一职,教育宗旨并未实际颁行,范源廉随即就任总长。上任后,他并没有因政党派系之争推翻蔡元培的教育规划,而是极力调解,尽力维持。在临时教育会议上,范源廉在发言中指出:“行政计划及教育宗旨业已由蔡总长宣布”^[7],不仅对蔡元培的教育宗旨全面肯定,又对教育作出“提倡个人职业独立”^[8]的补充,以供教育界讨论施行。会议结束后,9月2日教育部以大总统之名义颁行民国初年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9]。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完善也由此展开。可以看出,范源廉在其中以个人教育品格和行政领导权对民初蔡元培教育宗旨的坚持,以及对职业教育发展推进中的历史贡献,也在学界留下“蔡规范随”的佳话。范源廉在接任教育总长后,以教育行政的职能为民国初年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二) 颁行和推进民国学制,实现职业教育制度化

中国近代学制演变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历程。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学派的教育学说、社会教育思潮以及各种教育实验最终都以全国性学制系统的落实为依托。学制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教育教学的总体规划,它使全国教育发展有了明确系统的推进程序和步骤。在此意义上,中国职业教育的近代化也是争取建立全国性职业教育体系以及推进并完善学制系统关于职业教育规划的过程。范源廉在颁行和推进近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功不可没。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制定了《癸卯学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真正推行的学制体系。其中,实业教育成为教育系统中的一个类别,分为“实业学堂”“补习实业学堂”和“实业师范学堂”三类。客观来讲,《癸卯学制》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实际推行的学制体系,为后来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和发展设计了良好的框架基础。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失落,加之政局动荡,以实业学堂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发展较为缓慢。

中华民国建立后,在范源廉的实际主持下,教育部于

1912年9月先颁布了《壬子学制》,后范源廉虽然辞职,但教育部陆续公布的《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等各级各类学校规程,都与他在任时的推动分不开,1912-1913年颁行的各教育法令合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成为民国第一部学制系统。其中,实业学校分为甲种和乙种实业学校,相当于初、中等教育水平;专门学校又设有农工商等专门学科,相当于高等教育水平。这基本奠定了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架构,相比于清末学制缩短了学习年限,为学生早日进入职业生涯提供了条件。虽然《壬子癸丑学制》中关于职业教育体系的规划依旧不尽如人意,为职教先驱们所不满,但需要指出的是,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也应是渐进的,黄炎培等职教先驱们所进行的职业教育实践对完善中国职业教育制度化的作用是卓越的,但同时范源廉在国家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的民国初期,对职业教育体系的贡献也是突出的。

(三) 调整职业学校结构,规划职业学校发展

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结构失衡一直是近代职业教育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从清末实业学校成为教育系统的一种类型,到“新学制”大力提倡职业教育发展,职业学校都在整体上被予以类型化定位。然而,在实际推行中,实业学校或职业学校无论在学校数量,还是招生、毕业人数都与普通学校相去甚远。这不仅是受传统“从仕不从工商”观念的影响,还是全国学校规划结构失衡问题的表现。

对于范源廉而言,他也意识到了普通学校和实业学校在数量和培养学生质量上的失衡问题。他不仅提出这个关键问题,还对此尽力从整体系统上加以谋划解决。他指出:

“实业学校既供不应求,则实业人才之末,由造就可知;实业人才既未由造就,则社会实业之末,由振兴可知。由是言之,则实业学校不可不设法增多,以期能容求学之生徒,明矣”^[10]。对于这个问题,他提出“是故实业学校之校数冀其推广以宏造就,此一问题。实业学校之办理宜求改良以合实用,又一问题”^[11]。在他与另一位职教先驱陈宝泉的谈话中也提出:“至进行之手续,则取分年递进主义,第一年约改之一二,以后按年递进,总以各得半数为止”^[12]。

范源廉对民国职业教育于国民经济力和改善人民生计的作用有着清晰认知,并指出当时学校数量及学校发展的结构失衡问题。范源廉指出,推广实业学校数量应达到与普通学校相当水平,还提出学校培养人才需切合社会需要的主张。

(四) 重视并推进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相结合

振兴实业、教育救国思潮的推动,现存教育体制的流弊以及政治和经济时局的窘困等原因,催生了民国职业教育思

潮的产生和发展。范源廉也指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成为职业教育思潮的重要推动者。

1914年,范源廉指出,科学教育对于国家教育至关重要,“科学之功用,无论直接间接,皆足以增进国力者也”^[13]。范源廉所言科学,是能制造“生活所需之物品,国命所托之武器”的实用之科学,显然是包含职业教育内容在内的实用学科。1917年10月,范源廉在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训辞中指出:“经济竞争场中,其为中坚壁垒者,厥为实业”^[14],并提出到会诸学者各抒宏论,以供教育部参考改革发展职业教育。

此外,范源廉还意识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关系问题,范源廉于1913年提出“义务教育当规定于宪法”的主张,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他注重普通教育的发展,认为普通教育具有“启发个人之能力及培养国民适于生存之力”^[15]的功能。但范源廉所言新教育之普通学科,与传统强调“从仕”之学并不相同,而是要“于国家社会之情形与学者身心发达之程度”^[16]而进行。范源廉直言“普通教育可为职业教育、专门教育之基础”^[17],虽然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但足见范源廉对职业教育也加以重视,并强调与社会情形也即是实业发展、人民生计以及国家经济振兴相结合的思想观念。

(五) 实际资助和支持民国职业教育发展

民国时期,政府和民间的张力为职业教育思潮的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契机,众多职业教育家不仅著文立说,倡言职业教育,还躬行实践,促使职业教育理念落地。范源廉在民初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中,不仅以行政实践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还通过实际资助和支持他人实践来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民国初期,范源廉曾多次资助并为职业学校发展争取经费。1917年,范源廉与蔡元培、黄炎培、陆费逵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彼时,范源廉身为民国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不仅以教育部名义正式签批“应即准予立案”的公文,还以特别社员身份缴纳社费,资助其发展。1920年,北京务本女子职业传习所所长段廷珪请求范源廉资助维持传习所运转,在范源廉的呈请下,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捐洋五百元”以供传习所维持^[18]。之后,范源廉提倡女子职业教育,作为湖南私立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董事,申请法国“庚子退款”余额以维持“组织刺绣工场、附设职业教员养成所、扩充校舍和印行各种编织图案”^[19]等校务。范源廉以上做法不仅是其重视并实际支持职业教育的表现,也能看出其对男女教育平等和支持女子职业教育的观念。

1924年9月,范源廉被推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

事,翌年又被推为干事长。该基金会是中美双方在退还“庚子赔款”协商后的产物,客观上推动了民国时期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范源廉在任职期间,晏阳初致信请求资助平民教育实验:“谨悉贵会对于平教事业尚待研究,并派丁在君、黄任之二先生负责调查,嫩会至深欣幸!”^[20]在后来晏阳初在致黄炎培的书信中提出“得基金会五千元之辅助”^[21]。范源廉委托黄炎培进行调查和推进这项工作,可见范源廉重视并实际支持了平民职业教育事业。

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推进和发展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1913年,黄炎培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将实用主义与职业教育的联系引入教育界。1922年“新学制”中正式确立了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也与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孟禄和杜威访华的作用密不可分。其中,孟禄在1922年来华调查教育,在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对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具有推动作用。为方便孟禄在华调查,1921年,中国方面特别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后又改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以便其考察中国实际教育,范源廉便是其中最主要的发起组织者之一,并任第一届董事长。这都对孟禄顺利开展中国教育实际调查作出了突出贡献,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实用主义的传播和《壬戌学制》中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概言之,范源廉在民国初期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中,一直秉持“教育救国”“教育改造社会”的理想信念,并为之践行终身,职业教育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军阀混战的社会环境中,范源廉不仅通过教育行政的途径促进民国职业教育的体系化、制度化,还在具体实践中支持和推动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以史为鉴:范源廉职业教育实践的现实启示

(一) 落实职业教育地位,发挥职业教育功能

范源廉在民国时期对于职业教育地位和功能的认识可以为当下推进职业教育地位的落实,发挥职业教育功能提供参考。他批判传统教育对农工商的忽视,认为中国工业、经济之损失与此大为相关^[22]。对此,他提出在普通教育增加附有职业训练的实用科目,同时发展专门职业学校,认为职业教育在培养实用人才、改善人民生计、增强国家经济力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当前,我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明确了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然而,职业教育的发展在现

实社会中仍存在很大阻碍。一方面,我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绵延两千余年,成为民族记忆,至今仍有强大导向,导致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普遍偏低,并在不同地区呈现差异化的表征;另一方面,社会对于职业教育在人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的作用存在认知偏差,导致职业教育的功能发挥受限。这两方面相互交叉、互为因果,共同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阻碍。范源廉将教育提升到“救亡图存”和“改造社会”的高度,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他倡言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的对人与社会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和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会直接影响社会民众的认知,《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在实践中持续推进政策的落实,是提升社会认可职业教育的有效方式。范源廉在民国初期不断构建和完善职业教育制度,并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提升了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同时,对于职业教育政策与职业教育实际功能的宣传也是提升职业教育地位认可度的可行策略。范源廉、黄炎培等通过会议演讲、著文立说等方式为职业教育进行舆论造势,极大提升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当前,在《职业教育法》修订施行的背景下,继续推进和落实社会对职业教育地位和功能的认识和认同,是职业教育的应然取向。

（二）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普职关系和谐

范源廉认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各有特色,应分别予以重视。因此,他一方面研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指出,“余之意宜造就富于常识而有专长之人才,庶可应现时之需要。若无常识,则遇事理解不明,无专长则不克举分职之事业”^[23],致力于普职关系和谐;另一方面,他认为职业学校供不应求,导致人才缺失,因此致力于规划扩充职业学校数量,以和普通学校达到均衡发展。

时至今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问题,以及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体系建设的比例问题,依旧是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重点。范源廉对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的认识,以及对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比例的规划是其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重点及特色,对启迪当下深化普职融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范源廉的思想与实践,坚持职业教育类型属性,促进普职融通协同育人,构建普职学校比例大体相当的体系,应是当下职业教育办学的方向。

普职融通与普职学校比例协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归于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与构建。要实现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构建,需要“双管齐下”,从学制系统规划和学校

课程改革两方面入手。在学制规划上,必须坚持“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基本原则,允许不同区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24]。学校比例上的规划平衡是职业教育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基于此,应打造协同育人的全学段体系,推进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学校教育体系构建。在学校课程实施上,要坚持弹性课程的实施,促进基础课程与职业训练相协调的课程体系^[25]。课程教学是教育目标落实的关键抓手,普职融通既要加强普通学校职业课程的开设与渗透,增强职业启蒙和劳动教育,也要打造职业学校通识课程的基础性,增强基本素养和通识教育。

（三）推进校企合作，面向社会需求办学

范源廉在主持民国教育部工作时,多次强调职业教育要和实业界结合,要面向社会需要办学。因此,他呼吁“实业界与教育界常相联络以谋进步”^[26]。关于双方的联络沟通,他认为不仅需要实业界与学校多沟通联系,还需要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培养职业人才,而实业界也需要从众多方面助力职业教育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进行自助。这一思想对当下校企合作、推行企业办学以及发展职业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客观来讲,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主要表现在其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的特殊性上,此类学生的培养目标更倾向于就业,而社会对于职业人才的实际需求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最关键的导向。因此,实行校企合作办学,提倡产业办学等策略是直接面向企业真实需求办学,能够多方位提升办学质量。对于学校而言,产教融合不仅可以通过企业了解社会最新和最及时的人才需求类别和数量,还可以借助企业开展实习和训练制度,为学生提供最直接和真实的职业教育。对于企业而言,通过学校的平台进行人才的职前培训,能够进行具有针对性的人才储备,并且缩短人才的入职适应期,最大限度地发挥职业人才的使用效率。

实际上,企业作为办学主体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以洋务企业办学和传统学徒制的现代改造为主的实践,拉开了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序幕。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核心的以企业为主体的办学呼声再次兴起^[27]。因此,发挥已有企业办学的示范作用,改革现有职业教育单一办学主体模式以及完善企业办学的政策支持体系,应是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举措。继续巩固学校办学基础作用,推进企业办学的制度和特色建设,形成“产学研”相结合,“双元”主体共同育人的职业教育格局,是当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田正平, 阎登科. 教育行政系统的内外合作与民国前期教育——基于蔡元培与范源廉三度合作的考察[J]. 社会科学战线, 2013(3): 225-231.
- [2]吴洪成, 赵颖霞. 晚清实业教育思潮述论[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30-42.
- [3]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第1册)[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162.
- [4][9]范源廉. 教育部训令·训学校管理员及教员[J]. 教育杂志, 1912(7): 13, 5.
- [5]李梦卿, 赵国琴. 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先驱人物思想探析[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6): 73-83.
- [6]周洪宇. 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1: 409.
- [7][8]佚名. 特别记事·临时教育会议日记[J]. 教育杂志, 1912(6): 12.
- [10][11][14]佚名. 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开会范总长训辞[J]. 教育公报, 1917(14): 20-21.
- [12][18][19]欧阳哲生. 范源廉集[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86, 194, 445.
- [13]范源廉. 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J]. 中华教育界, 1914(23): 1-7.
- [15][16][17]范源廉. 说新教育之弊[J]. 中华教育界, 1914(17): 1-8.
- [20][21]宋恩荣. 晏阳初全集·第4卷·书信卷(1916-1989)[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3: 25, 75.
- [22]杨铨. 科学社第三次常年会范静生先生演说辞[J]. 科学, 1919(5): 504-507.
- [23]范源廉. 教育改进谭[N]. 1921-1-1(18).
- [24]石伟平, 李鹏. “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多重逻辑、实践困境与调整方略[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12): 42-47.
- [25]许译心, 沈亚强.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普职融通的困境与破解[J]. 教育与职业, 2015(10): 9-13.
- [26]佚名. 范总长招集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表到部茶话演说词[J]. 教育公报, 1916(10): 8-10.
- [27]王筱宁, 李忠. 现代中国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审视与前瞻[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5): 159-165, 186.

Fan Yuanlian's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and Its Realistic Enlightenments

Wang Zhewen

Abstract Fan Yuanlian was a famous educator in modern times and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n administrative officer and educator. Specifically, Fan Yuanlian adhered to the concept of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nsforming society through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e not only promoted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s an education administrator, but also made certain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bin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ocial needs, adjustment of vocational school structure, and actual fund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king this as a reference, we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implementing the status and functi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systemat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mplement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Key words Fan Yuanlian; voc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uthor Wang Zhewen, Ph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Education of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